

第 一 章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它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贯彻到了包括社会历史在内的一切领域之中。运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探讨社会历史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理论，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标志，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真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两项发现之一。

第一节 社会历史观及其产生和发展

社会历史观是人们对社会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等一般问题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人生活在世界上，不仅要同自然界发生联系，而且要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极其复杂的联系，从而构成社会生活和历史。社会历史观就是人们对社会生活及其历史进行探究和反思的理论成果。

一、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

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 社会历史观同一般宇宙观密切相关。宇宙观即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其中包括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想法。人们的世界观因其对象范围和抽象

程度的不同而区分出不同的两个层次：首先是相对而言较为特殊的、具体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有自然观、社会历史观、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等；所有这些的进一步概括，构成全面的世界观即作为整体的、更为抽象的世界观层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宇宙观或一般世界观。任何一种世界观，包括以世界整体的某一方面或部分为对象的自然观、社会历史观等等，相对于它们所反映的具体范围或内容都具有一般的意义。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所说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也就是一般宇宙观或一般世界观。区别出部分的、特殊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与整体的、一般的宇宙观或世界观，只有在在我们反思宇宙观或世界观的内在结构和层次时才是必要的。作这样的区分，是为了便于说明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关系，说明社会历史观理论在哲学中的地位。

一般宇宙观是人们对包括自身在内的世界整体的一般观点，而社会历史观则是人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社会的根本观点。后者是前者的组成部分，前者则给后者以统摄、支配和影响，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往往浑然一体，难以分开。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关系可以大体归结为：一般宇宙观包括社会历史观，但不能代替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观体现一般宇宙观，但不等于一般宇宙观。一般宇宙观虽然不能代替社会历史观，但它涵盖着社会历史观；社会历史观虽然不等于一般宇宙观，但它在整个宇宙观中却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社会历史观尽管不直接回答整个世界的一般问题，却回答人类社会这一物质运动最高形式的根本问题，而这实际上也就是回答一般宇宙观中的最尖锐的问题。因此可以说，社会历史观是一般宇宙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切较为完整的哲学，在其一般宇宙观中都包含着一定的社会历史观。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一般宇宙观同社会历史观必定完

全一致。恰恰相反，在哲学史上我们看到的往往是矛盾的情形：在同一流派甚至同一个哲学家那里，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观点同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观点尖锐地对立着。一般宇宙观同社会历史观完全一致的哲学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彻底的唯心主义，或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彻底的唯心主义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是某种精神的产物，在它那里，一般宇宙观和社会历史观统一于精神。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把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观点贯彻于自然界、社会历史和人类意识各个领域的哲学世界观。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或称实践唯物主义。这一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使一般宇宙观与社会历史观第一次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统一。

作为世界观中同一层次的两个方面，社会历史观和自然观也密切相关。自然观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本原、结构和演化的规律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等一般问题的根本看法。人们对自然界的这些看法，同他们对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根本看法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为人类社会不过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和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换句话说，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作为物质世界两大领域的内在联系，从根本上规定了反映这两大领域的哲学世界观即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内在联系。然而，社会毕竟是物质世界的一个特殊部分，社会和自然并非完全并列的、始终共存的两个领域。因此，相应地社会历史观和自然观必然存在着质的差别。社会历史观和自然观，分别以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的内在的本质联系和基本的发展过程为研究对象，既作为统一的宇宙观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相对独立存在，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关于世界整体及其内在联系的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科学的解决。

上述社会历史观与自然观的关系，就其基本的方面而言，也存在于社会历史观与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等之间，因为它们同属部分的、特殊的宇宙观或世界观，都从属于整体的、一般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人们的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等的特殊性，又使它们与社会历史观的关系同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的关系有所不同。这种区别的主要之点在于，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先在地位，直接地或曲折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并在其中表现出社会历史观对于自然观的某种依赖性。而在社会历史观与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等的关系中，情况正好相反，社会历史观对于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具有某种基础的、前提的意义。因为伦理、审美、科学等等都是特定的社会现象，都是社会的关系和活动，属于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领域。即使是以自然事物为对象的那部分审美活动和科学活动，也是处于一定社会的、历史的关系中的人的活动，也需要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来加以把握。因此，人们的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必然受到社会历史观的制约和影响。在社会历史观中，总是包含着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伦理、审美、科学等的一般理解。反过来，人们在伦理观、审美观、科学观等方面认识的深化和变革，也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作用于社会历史观，并推动其发展。

作为哲学世界观的社会历史观，同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既存在着某种共同点和紧密的联系，又明显地相互区别。它们的共同点是，都以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为对象，都是反映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但是，它们反映社会现象的角度和程度又各不相同，具有不同的方式和功能。社会历史观在整个社会认识领域中发挥着一般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作用，它概括具体社会科学提供的材料，回答社会生活中的一般问题。而具体的社会科学则以其特殊的理论和

方法 探讨社会某一方面、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 提供有关的具体知识，回答有关的具体问题。社会历史观的概括和提炼，离不开具体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具体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离不开社会历史观的指导和影响。

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历史理论

很久以来，人们就试图探讨和说明社会生活的本质。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曾经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作出种种解释，并展开过多次有意义的争论。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社会历史观上唯心主义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即使在那些试图用某种物质因素解释社会历史现象的哲学家们那里，尽管不乏真知灼见，更有丰富的思想材料、经验教训值得吸取，但都没有系统提出过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

社会历史观起源于人们对劳动及在劳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反思。在人类历史的早期，由于人类尚不具备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明确区分开来的能力，社会历史观只能浑然一体地包含在一般宇宙观之中。在原始人的眼里，社会和自然一样神奇，都只能凭想象去理解，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就是这样产生的。在对社会历史的探索过程中，人们最初往往把还不明其原因的现象归之于偶然。但是，这些偶然事件的力量却是那样地顽强，统治和压迫人们的时间又是那样地长久，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进一步去探求这些偶然事件背后的原因。神学家用超自然的作用，即用神灵的意志来说明历史过程和人类的进步。他们宣扬人间的一切秩序都是由“神”安排的，都取决于“天意”，从而把历史自身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因果关系纳入神学的宿命论。这在中世纪的欧洲尤为突出，在那里，神学历史观占据了支配的地位。客观唯心主义认为，人类的历史决

定于某种社会之外的神秘的精神，这种神秘的精神实质上不过是上帝的别名。主观唯心主义把人们的思想动机、意志当作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原因，认为社会历史是按照英雄人物的意志和思想构造的。这都是用人造的、虚幻的联系来代替社会历史的内在的、真实的联系。循着这条思路，是不可能达到历史的真理的。

与此不同，许多杰出的思想家，其中包括大多数唯物论者则试图用某些物质的原因来说明社会历史现象，并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论点和推测。

在我国先秦儒家哲学中，就有不少重视经济因素的唯物主义成分。如孔子主张先使民“富之”，然后“教之”。孟子提倡“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制民之产”，认为“民无恒产”则“无恒心”，主张把发展生产作为“德治”的基础。我国汉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王充在探讨社会治乱的原因时曾经指出：“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论衡·治期篇》）他认为社会的治乱和国家的安危都决定于时运和历数，而不在君主的有无贤德，政治的是否清明。这种看法有部分的真理。因为第一，它不用上帝、神的直接作用来解释历史过程，而主张去寻求历史事件的具体原因（自然原因），这就反对了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神学历史观；第二，它力图说明英雄人物的行为要受到某种必然性的制约，这对于那种寄希望于圣贤明君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无疑是一种批判。但是，王充并不了解社会治乱的真正原因，而将这种原因归之于时运、天数和“岁之饥寒”等不可预料的自然因素，不仅混淆了社会和自然的界限，而且最终必然导致宿命论的结局。

在欧洲，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一批先进的思想家勇敢地冲破了中世纪神学唯心主义的牢笼，对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因作了

持续不断的有益探索，提出了不少颇有价值的论点和问题，为唯物史观的创立作了理论准备。被称作“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思想家维柯（1668—1744）在这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说：“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在这里，维柯认为上帝创造自然界，并且只有上帝才能认识自然界，这固然是错误的；但他主张社会是人类创造的，而且是人能够认识的，却明显地突破了神学的传统。同时，维柯还强调了历史规律的普遍性、共同性。他认为，通过对人类各种民政制度的复演过程的研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不只是罗马人或希腊人在法律和事迹方面在特定时期的特殊历史，而是（由于在杂多的发展形态中在可理解的实质上仍然现出一致性）由一种展现出一些永恒规律的理想性的历史，这些永恒规律是由一切民族在他们兴起，进展，成熟，衰颓和灭亡中的事迹所例证出来的。”在维柯看来，社会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并且有规律可寻的，理想性的历史是遵循永恒的普遍规律发展的历史。严格说来，维柯对历史规律的理解还不能算是科学的。他只是按照生物个体发育的进程来描绘社会历史，认为社会必然经历神灵统治的神的时代（童年）、贵族统治的英雄时代（青年）、进而到达资产阶级统治的凡人时代（成年）。并且在经历三个发展阶段之后，又将重新开始同样的进程，从而把人类历史描绘成永远在一个

维柯：《新科学》上册 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第 154 页。

② 维柯：《新科学》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89 年版 第 597 页。

封闭的圆圈内循环的历史。这种描述包含着浓厚的主观杜撰的成分，但他关于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并按照自然必然性由一个发展阶段过渡到另一个发展阶段的见解毕竟是卓越的。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作为反封建、反宗教的资产阶级民主战士，曾提出过“人是环境的产物”的著名原理。他们所讲的环境主要是指政体和立法，而政体和立法的好坏又完全是由人们的理性决定的。于是他们又提出了另一条相反的原理：“意见支配世界”。这样的观点无疑包含着部分的真理。因为一方面，人确实不能摆脱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意见也确实对人的行动有很大影响。如果只看到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看不到人也能够改造环境，就抹煞了人的能动作用，不能不带上宿命论的色彩；而如果只看到意见对人的行动的影响，不去进一步探究意见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免不了得出唯心论的结论。事实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正是在“意见支配世界”的结论面前止步了，没有也不可能继续去探讨产生意见的更深刻的原因。于是，他们就陷入了“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意见支配世界”的不可解决的“二律背反”之中，最后不得不把历史进步的希望仍然寄托在少数天才人物身上，认为“必须有天才才能用好法律代替坏法律（爱尔维修）”这样他们终归还是没有跳出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尽管如此，他们提出的人的意见和社会环境的关系这一重要的问题，却成为启发后人进一步研究社会发展的最后动因的契机。

继之而起的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上，一方面继承了法国唯物主义者“意见支配世界”的原则，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看到了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现实无情地冲淡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性”光辉，因而又不满足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理论，力图有新发现。他们的杰出代表是圣西门。同法国唯物主义者相比，圣西

门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接触到了所有制对社会制度的决定作用这个重要问题。他认为政府的形式不是本质，“确立所有制才是本质，这种制度正是社会大厦的基石。”而追究财产所有制之所以能起如此重要的作用，应该到产业发展的需要中去寻找其根源。通过对产业历史发展的分析，圣西门还看到了阶级斗争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他深刻地指出，厂主和贵族代表两个不同的产业部门的利益，他们之间的斗争决定了 15 世纪以来西欧全部历史进程。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但是，圣西门终究摆脱不了唯心史观的束缚，没有在历史研究中把唯物主义因素贯彻到底，而是在“产业发展的需要”和“社会利益的对立”面前止步并后退了。他认为，人们为了生产必须有劳动工具，工具是被发明的，发明需要一定的智慧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因此，产业的发展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知识的进步是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研究人类历史也就是要研究“人类理性进化的历史”，那些具有高度理性的人对于社会的发展必然起着决定的作用。于是，问题回到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出发点，理性、意见、教育又完全地支配着世界。

同法国唯物主义突出伟人的作用不同，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觉察到人民群众的力量，探讨了阶级斗争的作用和它的经济根源。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们由于从法国大革命的震动中觉察到人民群众显示的伟大力量，使他们再也不能设想历史只是某些伟大人物一手造成的，因而主张要研究人民的历史。当然，在他们的心目中，人民群众主要是指资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不仅赞成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和教会的斗争，也积极支持它对新兴无产阶级的压迫，有的人（例如梯也尔）甚至亲自参加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尽管如此，他们在理论上的贡献却是难能可贵的。他们从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中，不仅看到阶级斗争决

定社会政治领域的历史进程，影响人们的思想和宗教观念，而且试图说明阶级斗争同经济利益的关系，认为利益是一切社会制度和事业的动力和源泉。基佐等人为了摆脱法国唯物主义者在意见和环境的二律背反中徘徊的困境，还提出决定民族风俗和国家制度的更深刻的因素是人们的公民生活和财产关系。他们认为，只有注意研究公民生活、土地关系以及一切财产关系，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

然而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这把钥匙 并没有帮助他们打开历史奥秘的殿堂。当他们进而探讨财产关系的根源时，便立刻陷入了混乱。他们不是认为公民生活（政治制度）和财产关系互为因果，就是以财产关系和征服相互论证，并且以所谓“人的天性”中的“征服欲”来解释征服的根源。这样 他们就又重新回到了 18 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个“意见支配世界”的老路上去了。

法国唯物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们，虽然在各自的不同条件下考察历史，但都提出并肯定了“环境决定人、决定人的思想面貌”的唯物主义原则；他们对环境和造成环境变化的原因尽管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却又都不得回到“意见支配环境”的唯心主义结论。他们始终只局限于对环境和意见相互作用的考察 长期深陷于“环境决定人”和“意见支配环境”的逻辑矛盾而无力自拔。

黑格尔在历史观上的首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正确地把人类的历史描写为一个过程，并试图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他认为，环境并不是最后的原因，在它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根据；人的意见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受一种“更高级的”因素发展的必然性所制约，只有认识了这种必然性才能有真正的自由。因此，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见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上，而应该超越这种相互作用，发

现某种新的“更高级的”因素。但是，由于黑格尔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他把这种“更高级的”因素归之于神秘的绝对精神，认为历史的规律是由绝对精神本身发展的必然性所决定的。黑格尔不再把某种永恒的人性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原因，而要求从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规律性中理解历史。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

绝对精神是一种纯粹的虚构，因而剩下的问题就在于，寻找出真实的客观因素来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总体上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是反科学的，无力揭示历史的真实规律。但他为了给自己的历史观加上某些科学的性质，就“常常不得不从蒙胧不清的唯心主义的顶峰降落到经济关系的具体的地基上来。每一次，只要他求之于经济关系的时候，经济就能使他从唯心主义使他陷入的暗礁处脱离开来。原来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本来就是决定全部历史进程的第一性的东西。”因而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中，隐隐地包含着若干极为宝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正如普列汉诺夫说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向我们暗中指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一位最大的唯心主义者似乎抱定目的要为唯物主义扫清道路。”

费尔巴哈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者，他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但是，在历史观上费尔巴哈却大大地落后于黑格尔。费尔巴哈清除了神秘的绝对精神，把自然和人作为自己哲学的基础，但却把人看成是脱离具体历史和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3页。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88页。

同上书，第482—483页。

社会实践的单纯的自然物。他以高度的战斗精神展开对宗教的批判，“致力于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¹；但他不懂得产生宗教观念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错误地把宗教意识看成人的自然属性（如恐惧情绪等等）的产物，并且更加错误地提出以一种新的“爱的宗教”来代替信仰上帝的旧宗教，从而完全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成为“半截子”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从上述简短的历史叙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各种社会历史理论尽管情况各异，各有得失，也曾提出过个别唯物主义的正确命题和不少有价值的思想，但在总体上和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列宁深刻地指出，一切旧的历史理论有两个最主要的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摸到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看出物质生产发展程度是这种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² 唯心史观有如此严重的缺陷，却在社会历史理论中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以致一切旧唯物主义者都无力挣脱它的羁绊，这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以前，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联系，历史发展的动因，都未能充分暴露。而狭小的生产规模又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不可能科学地阐

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页。

²《列宁选集》第2卷第586页。

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在小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生产者生产什么，一般是直接服从于生产者个人的目的和计划，这就掩盖了隐藏在人的目的和计划背后的作为支配力量的经济规律。另外，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人对人的剥削不是象在资本主义形态下那样通过劳动力的自由买卖的经济形式表现出来，而是靠特权，靠人身的占有或土地的占有来维持的。在这种超经济剥削占优势的条件下，被剥削者直接感受到的是剥削者个人意志的支配力量。这就使得历史唯心主义能够用各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来代替社会历史的客观的、真实的联系。这是唯心史观长期统治的社会历史根源。

其次，剥削阶级在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垄断精神生产，决定了它必然要夸大精神的作用，贬低物质生产的意义。历史唯心主义宣扬精神的决定作用，轻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否认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性，论证剥削制度的永恒性和合理性，都是适合剥削阶级利益的需要的。只要剥削阶级还未彻底被消灭，唯心史观就会被他们用作蒙蔽群众、维护其利益的工具。这是唯心史观长期统治的阶级根源。

最后 唯心史观的长期统治 还有其认识论根源。社会历史过程的最显著特点是人和人的主观意志的参与。在社会生活中，无论任何事情的发生 都不能不同人的自觉意图、目的以及人的活动有关。在认识社会问题时，如果只着眼于研究人的动机和主观意识的作用 而不去探究决定人的动机的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 就是说 如果只看现象不看本质 就必然会夸大精神和个人的作用 导致唯心主义。而一旦达到这一步“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

《列宁选集》第 2 卷 第 715 页。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的一段论述，精辟地概括了唯心史观长期独占统治的根源。他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于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科学的历史理论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中叶创立的。他们起初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后来恩格斯正式称它为“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认识史表明，对自然现象，人们比较早地达到了相对精确的认识，而对社会历史的认识则远远落后于前者。在这里，人们不得不长期局限于幻想的和歪曲的认识。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诞生以前，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一直处于统治地位。这是因为社会生活的现实联系和本质还没有暴露出来，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常常被人的主观目的、动机和意志等所迷惑，而剥削阶级的偏见又对社会历史极力加以歪曲。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能够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是由于当时具备了一系列的条件。首先是社会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的开拓，大大密切了人们之间的联系，扩大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有可能把各国、各民族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发现各国社会现象中的重复性和常规性，从而发现其中

的规律性。如果说唯心史观在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增长速度缓慢、社会关系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内的统治有其深刻的根源，那么，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的加速度增长、社会联系的广泛密切和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就为唯物史观的诞生创造了条件。其次，是思想理论条件。如前所述，在马克思之前，已有许多学者对社会历史问题进行过多方面的探索。在这些探索中，既取得了不少积极的成果，又得到了许多深刻的教训。正是由于这样，才使得唯物史观的创始人有可能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从而为发现社会生活的规律性，正确解决历史观的基本问题开辟宽阔的道路。恩格斯说：“如果说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 那末梯叶里、米涅、基佐以及 1850 年以前英国所有的历史学家就证明，已经有人力求做到这一点，而摩尔根对于同一观点的发现表明，做到这点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观点必将被发现”。最后 还有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那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实践。恩格斯说：“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 认识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 1831 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 1838—1842 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

正是由于社会的唯物辩证性质已充分显示，人类思想的历史已发展到酝酿新的突破之时，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又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智慧和创造，新的社会历史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第 50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 第 65—66 页。

论——历史唯物主义才终于应运而生。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创立，经历了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开端，可以追溯到对宗教的批判。我们知道，批判宗教神学，宣扬人文主义精神，重新确立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利益和权利，是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社会思潮的主流。唯物史观的创始人从这里开始对于社会历史问题的哲学思考，体现了人类思想发展的连续性。起初，马克思把自我意识看成人的本质，并用以批判宗教。这虽然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但通过对宗教的批判却敲开了通向实际生活的大门。接着便碰到关于出版自由问题和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使得马克思从精神领域进入物质利益领域，开始看到物质利益的重大作用。1843年马克思深入研究了历史和哲学写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初步清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问题上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44年，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从而把注意力从对上层建筑异化现象的分析深入到经济基础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著作中，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由异化上升到异化劳动，再进一步向唯物史观过渡的急剧变化过程。与此同时，恩格斯通过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考察，触及了现实社会中的深刻矛盾。他认识到，只有已往被忽视的经济事实，才是全部现实斗争和政治历史的基础。1844年9月至11月马克思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一书已接近形成生产关系的思想。马克思在1845年春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1845——1846年同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以物质资料生产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系统阐明了“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的一切变革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等一

系列根本性的观点和原理。这标志着唯物史观已基本形成。由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当时未能公开发表，这一新的历史观是在稍后的另外两部著作即马克思 1847 年写的《哲学的贫困》和马克思、恩格斯于 1848 年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正式公诸于世的。

马克思的崭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不仅在实践中诞生，而且在以后的实践中不断经受考验，不断获得证实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世的时候，他们就依据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经验，随时检验并不断推进自己的理论。1859 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扼要地作了系统阐述。1867 年《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表明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及有关书信，进一步阐述并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梅林、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以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在理论和实践上对发展唯物主义历史观做出了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社会历史观上的空前大革命。它结束了唯心主义对社会历史理论的长期独占统治，使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之上。这样，就使得“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从而开创了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极大地推动了历史本身和历史科学的发展。